

新中国万岁丛书



# 国之路

# 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

秦洞 维广 谭文革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之路: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秦洞等编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  
(新中国万岁丛书/张琦主编)  
ISBN 7-213-01889-2

I. 国… II. 秦…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通俗读物 N.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125 号

### 新中国万岁丛书

#### 国之路——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

秦洞 维广 谭文革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杨淑英  
封面设计 池长尧 顾 页  
责任校对 韦 伟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7 万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889-2/D·268  
定 价 1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攻”的200万军队。

当此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不仅适时作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英明决策，而且于3月5日至13日，在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做好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充分准备。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宣布，“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

会后第十天，即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亲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告别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现北京）。

预定的出发时间到了。毛泽东刚刚走出小屋，来到小院，周恩来就迎上来了。他十分关切地问道：“主席，又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形成了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担心毛泽东此时并没有休息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谈笑风生，走出了小院。这时，只见山坡上、道路边、田野里，到处都是前来送行的村民。那一张张朴实、憨厚、善良的脸庞上，挂满了热泪。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实在是太伟大、太神奇了。他们要再一次亲睹这位“大救星”的风采，他们实在舍不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他们的身边离开……

毛泽东怎能不因此而怦然心动！他向人群挥动着巨手。上车之前，感慨万千地说道：“进京赶考去罗！”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周恩来深知“赶考”的含义，因而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的未尽之言。

“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阐发深表赞同，接着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农民起义的历史，毛泽东素来情有独钟。他深深地知道，李自成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以后，由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只得退出了北京。以史为鉴，毛泽东在把中国大

地上的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吸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为了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论文，分析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因骄傲而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论文。1944年4月12日，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利用作战间隙致信郭沫若，特地告诉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用这篇文章，告诫全党入城后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重演李自成的悲剧。

到了1948年11月8日，当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定都北平的初步意向时，即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在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同志先行赴北平，为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毛泽东着重强调，进入北平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薄一波依令而行。出发前，他专门到中央请示有关事项。毛泽东就如何才能“不当李自成第二”这一重大问题，同他进行了可谓推心置腹的交谈。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泽东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准则。

就在告别西柏坡前夕，毛泽东来到了警卫班，亲切地询问大家：“你们进城工作准备好了没有？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战士们表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要做好保密与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决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很快，“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要合格”，成了从最高统帅到普通战士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3月25日下午5时，在北平西苑机场正式举行入城式。毛泽东因为没有适合在这种喜庆场合穿着的衣服，仍穿着棉裤和布棉鞋，外面套了件在延安时穿的皮大衣，乘坐敞篷吉普车，检阅了共约3万人的炮兵、坦克兵和步兵。随后，毛泽东乘车来到北京西郊的香山，住进了双清别墅。

这时，身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提出了一个让毛泽东不甚高兴的建议：请将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中南海。

本来，住在香山的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的几天中，来来回回地跑路，感到实在不方便，耽误工夫。但是，他又不愿意搬进中南海。叶剑英等了几天，没见动静，就专门跑到香山去探个究竟。但是，没想到毛泽东以十分严肃的神情，一语道破了天机：“我不搬，我不做皇帝。”

周恩来虽然赞同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便含笑对毛泽东说道：“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中央进中南海也是符合实际的呀，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连围墙都没有，……”

“不谈不谈。”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此事没有讨论的余地。

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周恩来无疑是心知肚明的。他转而暗示叶剑英：“毛主席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因为他不是、不应该是，因而也不愿做皇帝。”同时，周恩来又坚定地认为，共产党会不会腐败、会不会骄傲，关键在于实际行动和效果，而不取决于是不是搬进了中南海；党中央机关所在地首要的是要便于工作，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在周恩来看来，中南海地处市中心，工作特别是交通联络比较便利；四周的红砖高墙则是不可多得的安全屏障。“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坐在一边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不仅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而且当即加入了劝说毛泽东的行列。

“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把中共中央机关搬进中南海的问题上，由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很快达成了一致，毛泽东也就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了。“进京赶考”的毛泽东终于入主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在毛泽东的耳边，“决不当李自成”几个字犹如警钟长鸣。从入主中南海的第一天开始，他无论是于己、于亲，还是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注重了从点滴入手，防微杜渐。他要求工作人员把摆放在门口的许多竞相争艳的盆花搬走。“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上行下效地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结果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湖南和平解放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是介绍别人

进京。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刚成立，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尽管他们说的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别人的亲友可以来，他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他要树立一种风范。他一针见血地告诉秘书：“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学李自成，更不能像蒋介石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李自成、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据此，他还专门规定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四不原则”。即，“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毛泽东的这些原则一经确定，便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颇具代表意义的是，毛泽东的一个表兄来信，请他出面给文运昌介绍工作。文运昌曾是毛泽东小时候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荐人和担保人，还曾主动向毛泽东推荐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毛泽东也曾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作用。就这么一个表兄，毛泽东还是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并不是不重亲情。与众不同的是，他所注重的只是公私分明基础上的亲情。即使是遇到特殊的关系，他也坚决照章办事。人们知道，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更重要的是，杨家是支持革命的。在杨开慧被捕后，他们曾设法营救。开慧牺牲后，他们又冒着风险收殮尸体，以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女儿也在抗日战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对于杨开智这样的至亲，在他提出要来京工作时，毛泽东告诉中

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电杨开智说：“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杨开智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的，经受住了裙带关系方面的考试。

与毛泽东的情形相似，周恩来也曾在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以实际行动奉行着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出差顺路时可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菜票，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七、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身体力行，在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颇具传奇意味的故事还有：1949年10月1日，新疆乌鲁木齐数万各族同胞涌上街头，欢庆解放，欢呼新中国成立。在沸腾的人流里，出现了领袖人物的画像，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彭德怀。人们高呼“万岁”的口号，互相呼应，声震长空。当彭德怀看到这种场景后，尤其是看见人群中抬着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十分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还给共产党！胜利，人民的胜利，党的胜利！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大。”

正说话间，他的巨幅画像也被人们抬着向主席台走来了。彭德怀大踏步迎了上去，笑了一下，说：“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

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举着让它过闹市了。”说着，亲手将画架上的彭德怀像扯下来，撕了。人们惊奇、疑惑的眼光一齐向彭德怀射来。彭德怀知道欢呼的群众并不认识他，搞不好认为他是混进来的坏分子呢！于是高声说：“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这个画像上的彭德怀，请不要抬着我的画像。应该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

人们望着彭德怀，更加兴奋地欢呼起来！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他的岳父来住了几天，他就对爱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国家都有规定，你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老人家开始想不通，心想：女婿当市长，住一段时期吃几顿饭都不行么？陈毅就和张茜一起给他老人家做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国家才会兴旺，我们的革命事业才有希望。”老人家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听了这番道理，思想通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共产党无论是进京“赶考”，还是进入任何一个城市，不仅没有像李自成一样失败地退出北京，而是定都北京，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地夺取了新的更大的胜利。

## 奋勇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党中央进京赶考之时，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尚在继续进行。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了直接维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共产党人主京城前的1948年秋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相继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加上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至1949年1月，汇总

到毛泽东、党中央面前的战果统计是：自1946年7月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0余万人发展到358万人，其中野战军已达188个师共218万人，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特别是拥有远远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而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精锐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其总兵力下降到20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227个师约115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经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不难看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

想当初，蒋介石依仗其占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彻底关死国共两党的和谈之门，甚至宣称在3—6个月内“根绝匪患”。到如今，斗转星移，时过两年半，蒋介石面临的是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濒临绝境。即便是乞求美国政府增加援助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声明，也遭到了拒绝。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蒋介石痛感继续硬打下去已无法挽救其彻底覆亡的命运。于是，他想到了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于是，他再一次祭起假和平的亡灵，在1948年12月中旬放出“主动下野”的风来，提出与中共重新“和平”谈判。

然而，有些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素来与他貌合神离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此时因其军事实力尚未被解放军根本摧毁，因而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加上美国政府也表示支持“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因此，在12月下旬，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这场“和平”闹剧及其包藏的祸心，毛泽

东洞若观火。在12月间写就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引用了一个农夫因怜惜毒蛇而被咬死的希腊寓言，生动而又深刻地告诉人们绝不能怜惜像毒蛇一样的恶人，绝不能让毒蛇恢复了元气再来咬人，对于蒋介石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1949年元旦，就在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的同时，蒋介石却炮制了要求同中共共和谈的《新年文告》，声称要在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的前提下进行“和谈”。

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虚伪性。同时，明确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

(8)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国内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这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兵临长江，南京城内一片惊慌。日暮途穷的蒋介石被迫“引退”，并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桂系首领李宗仁自此代行“总统”职务。

就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李宗仁发表声明：“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不过，李宗仁之所以愿意以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实行“划江而治”，借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着眼于尽力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渴望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因而复电李宗仁表示中共愿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3月26日，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4月1日又加派聂荣臻）为和平谈判代表，同南京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和平谈判自4月1日开始。第二天，蒋介石就在溪口召见他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听取长江防务情况汇报。他的意图是，以淞沪为中心，重点防御沪杭三角地带，以优势的海空力量从台湾支援，持久坚守淞沪。据他估计，1950年一定发生世界大战，只要国民党军能支持一年半载，美国就会全力支持他。这时，他最担心的就是长江能否守得住，他期盼国共和谈能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据此，他对张治中规定的和谈基调是：一、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二、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三、关于军队改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说到底，就是要划江而治，实现所谓“平等的和平”。